

145

2207.29
671

清代卷

刘诚 著

中国诗学史

鹭江出版社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诗学史. 清代卷 / 陈伯海, 蒋哲伦主编; 刘诚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2. 9

ISBN 7-80671-139-2

I. 中... II. ①陈... ②蒋... ③刘... III. 诗歌史—中国—清代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9467 号

中国诗学史

清代卷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刘 诚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 350001)

开本 890×1240 1/32 10.875 印张 4 插页 245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1-139-2

I·37 定价: 22.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中国诗学史总目



ZONGMU

中国诗学史导言（陈伯海）

总论：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陈伯海）

先秦两汉卷（翁其斌）

魏晋南北朝卷（归青、曹旭）

隋唐五代卷（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

宋金元卷（黄宝华、文师华）

明代卷（朱易安）

清代卷（刘诚）

词学卷（蒋哲伦、傅蓉蓉）

后记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七卷，前六卷按历史朝代分编，起于先秦，迄于清末，每卷详述一个时期的诗学状况；另设《词学》一卷，综述词学的发展历程。本书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各类活动为纬，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 概 说

- 第一节 清代诗学的分期及主要倾向和主张 / 2
- 第二节 清代诗学展开的社会文化背景 / 9
- 第三节 清代诗学的主要表述形式——诗话 / 17

第二章 对于明诗的反思与审视

- 第一节 明代诗学的绪余和反响 / 27
- 第二节 宗宋风尚的兴起与《宋诗钞》 / 41
- 第三节 “心光”闪现论晚唐 / 50
- 第四节 “经世致用”与文学 / 58
- 第五节 清初诗学崇尚多样性和会通性的发端 / 68

第三章 清初诗学的建树

- 第一节 “开生面”的批评家王夫之 / 78



MULU 目录

- 第二节 叶燮《原诗》的体系/91
- 第三节 王士禛“神韵”说的意蕴/103
- 第四节 评点笺注中的诗学倾向（上）/116

第四章 王朝兴盛和学术繁荣下的诗学（上）

- 第一节 盛世的文学鼓吹/135
- 第二节 对诗学既成传统的取舍与推扩/146
- 第三节 情意与法度的交融/157
- 第四节 学问与性情的互济/169
- 第五节 评点笺注中的诗学倾向（中）/179

第五章 王朝兴盛与学术繁荣下的诗学（下）

- 第一节 格调说/193
- 第二节 性灵说/206
- 第三节 肌理说/219
- 第四节 评点笺注中的诗学倾向（下）/230



第六章 新旧交替之际的诗学

- 第一节 龚自珍：近代文学思潮的先声/243
- 第二节 “经世致用”说的再度兴起/256
- 第三节 传统诗学观点的延续和演进/268

第七章 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

- 第一节 “过渡时代”的“诗界革命”/294
- 第二节 南社：政治与文学的矛盾和统一/304
- 第三节 王国维、严复非功利的文学观/313
- 第四节 对“雄声”的推崇与召唤
——早期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文学主张/328

主要引用书目/337

第一章 概 说



清朝是中国古代史、从而也是中国古代诗学史的最后阶段。中国的诗学，历经从先秦迄明代这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业已形成一系列比较完足的、并立的观念和体系，清人面临着古人丰厚的诗学遗产。清代诗学在自身的进展中，对以往的诗学成就作出了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选择和阐发；换言之，具有不同路向的诗学观念，在清人的活动中得到回应和扩展。这既显示了清代在诗学史源流中的地位，也多少能表明清代诗学的固有特点。

由于诗学的性质和内蕴在千余年中得到逐步认定并被阐述得相当完善，清人除了有所更新以外，更重要的使命是对之加以回顾和总结。重提历史是诗歌创作引起的实际需要，也是对确定的理论和观点的进一步深入和完成。就大体而言，清代诗学走向高潮在其中叶，与清代整个的学术文化同时完成了总结性的工作；这种共同性符合社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命运和气数相称。总结的直接基础是对明代诗歌和诗学的反思、批判，总结性本身有融会贯通的含义，这正是从明诗及其诗学表现的偏狭和固陋中引出的教训。即使时光延至晚清，总结性依然可见于某些诗学的论述中。然而，19世纪中后期历史的巨大变动有力地从外部并通过文人心理的反应促使诗学产生蜕变，蜕变是形或质由旧趋新的渐次

的变化过程，这无疑意味着古代的诗学即将结束其行程。

第一节 清代诗学的分期及 主要倾向和主张

清代诗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为顺治、康熙时期；中期以乾隆时期为主，前后的雍正、嘉庆也属之；后期始于鸦片战争前后迄民国的建立。以上分期以君主在位时间为界限，其实，诗学进展的内在脉络并不一定受此限制。

初期 朝代更替产生了明与清的断隔，但诗学研究仍内在贯通，前后相续。更重要的是，对前朝文学遗存的回顾和整理，从清初开始就相当突出。人们试图总结一个过去时代的诗歌创作的基本状况时，也意味着诗学的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明代流行的主要诗歌流派和诗学观念，在清初文人学士的审视和评述中，其地位、意义被界定；至于诗人个人作品的长短优劣，也在深入细致的剖析中一一昭显。这样，在后人的视野中，明代诗歌及诗学就成为被大体论定的对象；诗学得以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进。清初的诗论家关注明代的诗歌，从时间的顺延上看是自然的举动，而且还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康熙在位长达六十余年，通过观察可知，这期间诗学历经的转化较为明显。在完成了对于明代诗歌的系统全面的整理和品评后，清代诗学的任务就是进一步深化对诗学基本问题的探究并作出阐释。

中期 在参考借鉴传统成说的基础上，展开自主性的论说，是清中期诗学繁盛的重要特征。承清圣祖抚平天下后的安定局面，清高宗继位当政，清王朝进入繁荣时期，也是诗学的





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诗学活动的方向、内容和方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社会环境以及统治者思想文化政策的制约。在这样的制约下，人们各依其性情所近、学力所诣，或力主一说，或采纳众说而综合折中之。各家之说都表现为对诗学史中若干历久弥新的重要问题探索的深化和再度阐发，诸说的交合之处是选择、权衡中趋同性思考的结果，以考据为特点的治学风尚几乎使各种诗学观念多多少少地向学问倾斜。从乾隆后期到嘉、道年间，国势渐弱，人心浮动，文人的忧患意识时隐时现，预示着诗学中新的变化的来临。

后期 大清王朝的腐朽衰弱在侵略者的炮火声中暴露无遗，内外矛盾和社会动荡激起了更强烈的心灵冲突，有志之士激情的呼喊惊醒了迷醉于颓废无聊的文字中的文士，他们的论说也为诗学开辟了新的世纪。诗学中的蜕变及新的因素与恪守旧有传统的诗学观处于不断的互相消长之中。19世纪末，新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也借助诗学的传统形式及某些内容来进行思想文化和政治的宣传。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欧美的社会变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等，成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建立自己的学说或表明其见解的有力支持，中国的传统诗学因此走向终结。

考察清代诗学观念自身的演进，可以判别出纵贯以上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倾向或基本主张，这些倾向或主张皆可在诗学史中溯源探流，而其在清代的持续和不同程度上的变化，则显示了诗学发展内在的有机统一。

在中国诗歌史及诗学史上，特别是唐代以后，崇尚古人或崇尚古代既成传统的观念和流派不时兴起，这缘于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特征。因此，师法、效仿古人之作即便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也视作理所当然。明代在诗文领域占据主流



的是前后七子复古主义的文学观。尽管“诗必盛唐”的固陋不断受到相异的文学势力的冲击，但时至明末清初，崇古的诗学并未从诗坛消失。陈子龙、毛先舒先后对明七子的所谓“大雅”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而且这发生在复古思潮已受到激烈批评的情形之下。

师古的心态和主张有着长期的历史积淀，在整个清代是时起时伏。虽然其弊失已为学士文人所认识，但是师古之风在稍加变动和修正后仍得以延续。倡“神韵说”的著名诗人王士禛之于唐诗，实际上是用澄淡秀逸取代高华伟丽，这两种风格的宗尚均不外乎盛唐。但也不可否认，王氏的“神韵”及所立说，除出于对王维、孟浩然等人诗的推崇之外，尚有其他的促成因素。“格调说”是典型的师古学说，在沈德潜的心目中，《诗经》和盛唐诗具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他所论重本源、明诗教；在他看来，“风雅之遗意”应该成为诗歌回归到本原的着力的所在。对体格声调及一般法度的解说，主要是对唐诗传统的维护，其中可以闻听明七子的遗响。但“格调说”比起明七子的胶固来较为通达。清中期“格调派”有一定的势力，这与其以推崇风雅自许而产生的影响力颇有关系。“神韵”诗和“格调”诗及其诗学表现看上去有很大的差异，“神韵说”似乎虚无缥缈，而“格调说”则提供了一个切实的规范，但在尊崇唐诗传统上并不相悖。

师古之风在晚清尤为盛行。出于对“性灵派”末流的惩戒，程恩泽、何绍基等掀起“宋诗运动”，以苏轼、黄庭坚为正面的典则，一反那种流衍而无止极的油滑、率意的诗风，主张偏向于宋人的学问和征实。从另一侧面看，此举有明显的向往和恢复传统的用意，企图固守其所标榜的宋人的人格和诗格。“宋诗运动”的倡导者不是去适应变动的时势，而是以保



守的心态扬阐宋诗之传统。因此，近代的宋诗派也染有较明显的师古之气。对后来的“同光体”也可作如是观。

复古意味最浓厚的是以王闿运为首的“湖湘诗派”，王闿运认为，古人诗“尽善尽美”，因而应从形和神内外两个方面去揣摩和模拟汉魏六朝及初盛唐诗。这种观点是一种与古代的传统难以割舍的意愿的外露，因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珍视的传统此时已经摇摇欲坠。如果说“湖湘派”等流派是站在守旧的立场以作诗来保持对旧文化的雅好的话，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则是站在激进的政治立场上来表明对唐诗传统的倾心 and 爱好。“南社”在以民主革命作号召的同时，又主张保留传统的“国粹”。柳亚子用民族主义的眼光看待唐诗，同时贬斥宋诗，因为宋诗与守旧的“同光体”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柳亚子等人处在历史的剧变关头，在诗学上严格唐、宋诗之间的界限，而不是朝新的方向作探索，显示了传统诗歌影响力的深厚。中国师古的诗学的完结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得到表现。

清代诗学的师古倾向直接来源于明代，而与之对立的崇尚自心的诗学则从与复古派的论辩和引发的教训中产生。“公安”、“竟陵”强调好诗从内心流出以及用心与古人诗之精神相接，对于那种步趋古人格调、只求外观上合于古人的固陋予以无情的批评。清初吴乔、冯班等人从中晚唐诗中挖掘出精神和艺术价值，使之从遭明人鄙薄和忽略的不利地位中成为受到认真审视和显扬的对象。吴乔发现，诗人创作中的主观因素“心光”可以与中晚唐诗中的个性特点相契合。中晚唐诗在盛唐之后能别出手眼，对于启导后人不在前辈崇高成就之下无所作为是有益的，从而就为师心自用给出了伸张的空间。师心之说注重的是主观的心灵，诗人的创作以自己的性情个性为转移，不再依附那些曾经盛行和极受尊崇的诗歌的典型。袁枚的“性灵



说”接续公安袁氏及吴乔等人的诗说，进一步推崇诗人主观的创作精神，多少突破了传统的观念，为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注入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更多的个性因素。在袁枚看来，“情”的正与不正非诗考虑的主要问题，而“情”的真与不真才关系到诗歌的生命。“性灵说”既然力图挣脱羁束，故也促使了作诗时手与笔的放纵，与历代积累下来的法度格调产生了一定的离异。继“格调派”之后，“性灵派”大行于天下，诗人日渐增多，可见“性灵说”确有一种鼓动作诗热情的动能。

鸦片战争前后，时局纷乱频仍。龚自珍目睹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征象，心灵深处的忧患意识涌动不已，他从人生的回忆中期盼“童心”来复：“童心”意指自由和个性，可用以反抗现实环境及精神上的压抑。而其“尊情”、“尊心”之说，是要求文学作品担当起宣泄内心情感的作用。龚自珍“心史”合一的学术和文学观点，既崇扬了学术及文学活动中主观精神的发露，也表明其对政治现实和社会状况的高度关注。他的历史批判精神和对改革的呼唤，可由此导出。龚自珍独立不羁的精神和个性以及思想、文学上的倡说，给后来立志突破传统诗学观念的人士以极大的激励。此外，龚自珍“我论文章恕中晚”的表白与清初师心之说中涉及对中晚唐诗的价值认可不谋而合。

“诗界革命派”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批判受到龚自珍的影响，他们既然以“革命”作标榜，显然有在文学方面突破传统的意图和勇气。梁启超以开辟新大陆的比喻来揭明新体诗写作具有的披荆斩棘的不凡意义。这一“革命”的实质，是用“新精神”、“新理想”、“新意境”融入诗歌固有的格局、风格之中。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派”在写作中并不能舍弃诗歌原有的艺术传统，但对“新”的追求当居主导地位。他们实际上已为现代诗歌的产生作了理论上的先行探索。“诗界革命”的实



践者黄遵宪声言“我手写吾口”，虽然其实际成效尚存疑问，然而其主张已大大向前跨了一步。

具有师心倾向的观点和流派，在具体的阐述和创作中，表现出应因或迎合其所处的不同时期的背景、环境的特殊之处，有的甚至有显著的差别；但其旨趣与恪守特定诗歌传统的师古倾向成分立之势。

师古与师心的分立乃至对立，是清代诗学进展的主要内容。在这两者之外，求实的观念也是清代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

求实的倾向出于对明朝亡国的惨痛事实的深刻思考。明人空疏不学，关于文学的论说又多无关宏旨，“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于是被郑重提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有益于国计民生才是其根本的旨归。“经世致用”是以可征验的实学为基础的，由于宋代文人及其诗作在学问上较为擅长，因而，顾炎武首倡的“经世致用”说逐步衍变，并和宗宋的诗学倾向合流。以宋人为尚的诗人大多数学问博洽，诗亦以征实为特征之一，清初和清中叶的浙派诗人大都如此。清初最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宋诗钞》即系浙人编成。尽管清初宋诗曾盛行一时，但在理论的表述上阙如。一直到翁方纲标示“肌理说”，宗宋并求实的诗学才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形态。“肌理说”的问世恰逢清中期学术风气大盛之时，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推顾炎武为清代汉学之祖，也并非偶然。

“肌理说”可以认为是学术考据对文学进行渗透的结果，“学人之诗”这一名目出于诗人之口，颇显对学术和学问仰目而视的姿态。清中期各种诗学观念的主导倾向并不一致，但是，几乎没有一个诗论家不把具备学问看作诗人的基本素质。当翁方纲说“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时，可以认为这是文学求实



观点的极端化的表达。

由于受到新的历史形势的激发，到了晚清，“经世致用”说再度兴起，从龚自珍、魏源到梁启超、黄遵宪等都十分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的观念和学说追随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因此，他们的诗学具有新的时代因素。与其他的倾向、流派也有合有离。

宗宋和求实是同一诗学倾向互相交合的两个方面：求实是对诗歌内质的要求，宗宋表明诗人对求实风尚的历史参照和追寻。在清代，宋诗得以和唐诗并行，与求实的诗学观念是分不开的。从《宋诗钞》到“肌理说”，一步步地推动了宋诗派的壮大。相对元、明两代而言，清代宗宋诗派的崛起和发展，是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晚清的宋诗派与中晚唐诗派及汉魏六朝诗派一样，都具有恪守传统的倾向，不能适时应变，所以，就清代诗学的源流而言，其崇尚的不同依旧清晰可辨。然而，不能顺应时代潮流并不妨碍其诗学理论的修正。何绍基、郑珍等人治经史小学卓有所成，在重学问的同时，更重“不俗”之为人，所论也不轻忽诗中真性情的流露。他们不赞同翁方纲主张的以考据入诗，锲钉渔猎之小技更受到非议。可见宋诗派以学问为基底的诗论有一定的圆活性。

“同光体”以其广泛的影响最终结束了清代宋诗派在文学舞台上的活动。“同光体”著名的诗论家陈衍以“不墨守盛唐”一语作为其宗宋的诗歌特征，另外，“合学人、诗人之诗而一之”的倡导，是要在诗歌与学问间建立一种互相调和的关系。他还认为学问是构成诗歌的本然要素，学问可自然地化解到诗歌中去，成为诗歌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大体上看，清代师古、师心、求实这三种诗学倾向与对



盛唐、中晚唐、宋诗的崇尚是对应的，当然，这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在上述各倾向和崇尚间泛涉而兼采并加以整合也渐成趋势。从清人的诗学活动中可以领略其对古代诗学遗产的继承与总结，也能窥见会通性的主张在诗学观念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清初钱谦益不薄中晚唐与宋元的文学度量对于后世是有益的启导。

清代诗学会通唐、宋及不同体格的趋向在中期得到了深化，诗学的各种概念和术语被详尽地讨论和阐发，继承与出新、拟议与变化、性灵与学问、情意与法度等相关性的论题在传统成说的基础上的辨析和论说是细密而周到的，在对应的两者之间的折衷、融合或者互济是普遍的见解。他们坚持一种主要的观点，又不乏对之加以补缀以免偏颇的意图。

在清代诗学的诸流派外，王夫之、叶燮以及王国维等独立从事诗学理论的探究。王夫之审视中的问题是传统的问题，但他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新的阐释，眼光深入而独到。叶燮诗学体系的基础是对历史进化的认识，他提出的“理、事、情”和“才、识、胆、力”，涉及到几乎全部的诗歌创作的主、客观要素，具备了高度的理论概括力。此二人都是清代成就杰出的诗论家。王国维的文学观念有最明显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和美学的印记，他强调的“真感情”可使艺术创作的动机得到纯化，排斥功利的干扰，从而为中国传统诗学增添了新的因素。

第二节 清代诗学展开的 社会文化背景

清代诗学是在其所承接的历代诗学传统的基础上展开和演